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山西文学概论

一

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命运的决战决胜时期。抗日战争终于胜利结束，解放战争宣告了蒋家王朝的覆灭，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站立起来。文学是时代之花。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文学，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炮火的洗礼，由小变大，由弱到强，蓬蓬勃勃地成长起来，栉风沐雨天地间，“战地黄花分外香”。这是“新的人民的文艺”，它描述的是“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它运用的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它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哺育的丰硕成果。如果说抗日根据地、革命解放区是未来社会主义中国的雏形的话，那么，陕甘宁边区、山西根据地文学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文学的基本模式。20世纪40年代的山西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举足轻重的位置。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历史，真是风云变幻，波澜壮阔。1941年到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也是中国抗战极端困难的时期。日本军国主义调集重兵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并对蒋介石进行政治诱降，企图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之后，蒋介石集团顽固奉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策划了围歼新四军的大阴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取得了对日本的胜利，苏联和蒙古政府向日本宣战出兵，我解放区军民粉碎了日军的一次次“扫荡”，迫使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向中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庆祝八年抗战终于胜利的欢呼声中，蒋介石政府一面装出和平的样子，一面却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粉碎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全面围攻，又势如破竹地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紧接着，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政权的灭亡。

在整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我根据地、解放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或者说它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解放区是中国革命的红色摇篮。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处于全国抗战前线的特殊位置。因此，巩固和壮大山西各根据地，就显得尤为重要。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几年间，山西的晋东南（太行、太岳）与晋西北（晋绥）一南一北两大解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生产运动等搞得如火如荼，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各级文艺领导组织和文艺团体也相继建立、健全起来，有力地促进了解放区文学的长足发展和繁荣。解放区文学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产生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具有自己独特内容和审美形式的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它异军突起，走向成熟，与全国其他区域的文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景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革命解放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摧毁地主阶级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在这种历史巨变中，几千万在政治上翻身的农民提出了文化翻身的历史要求，这是解放区文学产生的前提。卢沟桥事变以后，许多作家陆续从上海、北平等都市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及群众性的文艺活动相结合，使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各种门类的文学创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文艺性的刊物、报纸也纷纷创办。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专业作家与群众文艺运动相结合，中国传统民间文艺在现代新文学的启迪下得以蓬勃复兴；反过来，民间文艺的创造活动又补充丰富了现代新文学。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从20世纪20年代就倡导‘大众文艺”，30年代的左翼作家又竭力推行无产阶级文学，但直

到 40 年代，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后，中国的新文学才真正走向大众，并在人民大众和民间文艺中获得了一种强劲的生机和活力。在 40 年代的七八年间，解放区各种文学门类的创作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小说方面的代表作有康濯的短篇小说《我的两家房东》、《初春》等，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等，欧阳山的长篇小说《高干大》，柳青的长篇小说《种谷记》，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等等。诗歌的代表作品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张志民的《死不着》，田间的《赶车传》，李冰的《赵巧儿》等等。这些丰硕的创作成果证明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有着广阔的前景，创造性地借鉴民间文艺中的优秀传统，同样可以形成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

山西解放区文学是全国解放区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期间的七八年间，得到了迅速而强劲的发展。山西的大众化文艺运动和思潮由来已久。早在 1932 年，史纪言、王中青、赵树理等就组织成立了“大众文学研究社”，创办刊物，发表作品，开展文艺论争，竭力主张文学的大众化，主张文学同现实的结合。抗日战争开始后，面对严峻的现实，山西作家们更深切地认识到：为了鼓舞人民团结抗日，为了揭露国民党、阎锡山的黑暗统治，文学更应该摒弃小资产阶级情调，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和现实斗争，倡导一种富有“活力的”“深刻的”“讽刺的”“辛辣的”、具有大众化特征的文学。经过多年的理论宣传和创作实践，山西的本土作家史纪言、王中青、赵树理、冈夫、卢梦、田景福、张季纯等，在继承五四文学、左翼文学的基础上，已把大众化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成为山西文学的主流。此后，山西的这些本土作家，分散到各个解放区从事文艺工作，又适逢解放区的特定环境和土壤，于是，大众化的文艺种子破土而出，郁郁葱葱地成长起来。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全国的许多著名作家，纷纷云集山西，抗日救亡、建设解放区，为山西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机遇。丁玲、周立波、卞之琳、吴伯箫、沙汀、何其芳、刘白羽、陈荒煤、艾青、田间、阮章竞、吴奚如、柳青、萧红、端木蕻良、康濯、贺敬之、杨朔、公木、于黑丁、亚马、徐懋庸等等，这些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作家，他们在山西有的逗留时间很短，有的只是匆匆而过，有的则在山西“扎根落户”，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在山西这块炽热的、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开展革命斗争，从事文学创作，宣传文艺主张，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成为山西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一页。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型的作家，他们更多地继承了五四文学的启蒙主义思想，有着开阔的文化、文学视野，

有着较高的审美思想和境界，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技巧。在战争实践和同工农兵大众的结合中，他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和升华，也使他们的创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型和飞跃。外来作家的创作成果，如一股清新、强劲的春风吹进山西的革命解放区，深刻地影响和丰富了山西的文学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山西文学的发展。这种现象在山西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是对相对封闭、落后的山西新文学的一次大碰撞、大开放，是对山西本土作家的一次大冲击、大提高。

1942年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揭开了山西解放区文学的新篇章，山西两大解放区的本土和外来作家，一面认真学习领会《讲话》精神，一面深入到农村、部队和工厂体验生活，极大地激发了创作热情，更加坚定了为工农兵创作的文艺方向，在“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探索方面也日趋成熟，于是有了山西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的一次空前蓬勃和繁荣，形成了山西现代文学的一个高峰期。赵树理的出现，对山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等短、中、长篇小说的陆续发表，极大地轰动了各个解放区，同时也冲击着全国文坛。他不仅很好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传统，同时把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的大众化文学思想变成了一种成功的创作实践，在艺术形式上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魄”的广阔道路。赵树理的创作，被誉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赵树理的创作，被奉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的一面“旗帜”、一种“方向”。赵树理的杰出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山西解放区广大作家的创作，给正在进行艺术探索的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等以无尽的启迪和鼓舞，他们的创作迅速地走向成熟，创作出了《吕梁英雄传》等一大批优秀作品。阮章竞的《漳河水》、《赤叶河》也应运而生，代表了当时诗歌、歌剧的最高成就。戏剧在解放区遍地开花，《万象楼》、《刘胡兰》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反映生活迅速、艺术形式活泼的散文、报告文学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山西解放区文学一派丰收景象。

二

毛泽东的《讲话》是大规模的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倡一切从

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向全党提出了反对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1942 年 2 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接着，又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指出这次整风运动的宗旨，就是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讲话》论及了延安整风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对当时解放区文艺运动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同时对革命文艺历来所关注、所争论的诸多理论问题也作了系统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现实相结合的重要成果。《讲话》试图解决这样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即在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有条件进行广泛的政权建设和开展群众运动的历史阶段，应当如何领导文艺工作，怎样才能创造出适合人民群众要求的新型的文艺。《讲话》不是纯粹的文艺理论著作，毛泽东是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谈论文艺问题的，具有很强的政治策略性，主要思考的是一些关于党如何领导文艺的根本性的政策问题，包括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批评标准、对文艺遗产的批判继承、加强文艺队伍建设、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等等。

毛泽东高瞻远瞩，抓纲张目，从众多纷繁复杂的问题中抽出一个根本性的命题，那就是革命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其实是从五四以来就一直在探索、争论的问题。20 世纪 20 年代提倡的“平民文学”，“平民”实际上是指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20 世纪 30 年代推行文艺大众化，“大众”指的是普通的下层民众。但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尽管清楚文艺为谁的问题，而作家往往是站在高于民众的层面，对民众进行启蒙、教育，民众在文学中并没有获得独立的、主体的位置。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少模糊的、偏颇的认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毛泽东正是鉴于这样的历史问题和现实状况，明确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这就比一般讲大众化、平民化要具体得多、明确得多，具有很强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因为解放区的人民大众就是工农兵，他们是革命、战争、建设的主体。在“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上，毛泽东突出地强调了作家、艺术家要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群众生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去，实现同工农兵的真正结合，这样才有可能获取生活素材，进入创作过程。毛泽东还站在人民群众对文艺需求的角度，突出地强调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普及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工农兵群众需要“锦上添花”的文艺，更渴求“雪中送炭”的文艺，“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

《讲话》所着重解决的是革命解放区在战争环境下党领导文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无疑具有正确性、权威性、指导性，起到了统一思想、推动文学发展的巨大作用。《讲话》的基本思想毫无疑问具有经典性、普遍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各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文艺整风运动，自觉检查工作中、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触动很大、教育很深。为了引深文艺整风运动，1943 年 3月 11 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又在延安召开了党员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出席会议并发言，凯丰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讲话。陈云的讲话就党员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弱点——自视特殊和自大自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提出了文艺工作者以什么资格做党员的问题：究竟是一个以文艺工作为党内分工的党员呢？还是一个附带做党员的文艺家？前者是党所要求的，因为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后者是党所反对的，因为那样的党就变成了“各界联合会”，这是一个党员文艺工作者必须解决的问题[1]。这些讲话，进一步阐释、论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和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文艺思想。这次会议对解放区文艺整风运动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延安的许多作家、艺术家纷纷深入基层，到农村、部队、工厂体验生活，实现与工农兵的真正结合，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获取灵感，发现题材，进行创作。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中，对王实味等人的政治性批判，是整个整风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各解放区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深刻的影响。从1941年到 1942 年上半年，王实味、丁玲、艾青、萧军、罗烽等人，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和《谷雨》、《文艺月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一批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体现了他们一以贯之的创作倾向和文艺思想。这些知识分子型的作家，信奉五四文学精神，坚守启蒙主义立场，又深受欧洲和苏俄文学的影响，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兴趣有加。他们从国统区来到解放区，面对

解放区所倡导的一系列文艺思想，所推崇的“大众化”文学作品，还有解放区的政治文化氛围和现实生活，虽然他们在努力适应这样的环境和这样的文艺，但思想感情深处的那种隔膜和抵触，还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1942 年前后的这一批作品，集中反映了他们的一种集体性表现和抵触。如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丁玲的《我们需要杂文》、《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和《我对于目前文艺上的几个问题的意见》等等，罗烽和萧军也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白了自己的文学观念。

应该说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创作倾向和文艺思想，并没有违背艺术规律，属于一种正常的文艺争鸣。但它却不能见容于当时汹涌澎湃的工农兵文学主潮，不能见容于政治色彩浓重的解放区文艺思想。因此，延安文艺界立即做出反应，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文章批驳王实味等人的文艺思想，并上纲上线，由思想批判上升到政治批判，错误地判定他们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等等。与延安文艺界对王实味的批判相呼应，其他解放区对另外一些作家、作品也进行了批判。把正常的文艺论争变成一种政治批判，是一种典型的极左思潮，其教训是深刻的。

山西解放区学习《讲话》精神，进行文艺整风的运动也迅速地开展起来。晋绥根据地负责文艺工作的同志，从延安回到解放区，立即向边区文联和剧社等传达了《讲话》精神，并多次召开文风检查座谈会，对文艺的领导工作、文艺工作者的生活与作风、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检查。1942 年 11 月，晋绥文联组织文艺工作者，分三批奔赴基层农村、部队、县区，带着组织关系、供给关系，有的还采用挂职方式，真正深入到了基层。从 1942 年 11 月到 1943 年底，这些文艺工作者在基层生活工作一年多，参与现实斗争，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创作文风有了很大的改变。

太行、太岳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对《讲话》的学习贯彻，纠正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错误思想倾向，“文联工作才真正明确了方向”，“才使我们认真考虑了‘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并且使我们认识到要为工农兵服务首先要向工农兵学习。而为此首先要深入工农兵，真正与工农兵结合”[2]。1942 年 9 月，太行文联的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兵分四路，到解放区的先进区、落后区、游击区深入调查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状况，历时三个月，收获甚丰。

在太行解放区文艺界，不同思想的文艺论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1941年10月，《新华日报》华北版开展过“关于‘演大戏’的讨论”；同年秋天，《华北文艺》杂志又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就在同时，赵树理与王春、林火等人发起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在《抗战生活》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大力倡导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引起了解放区的广泛关注。就在这样一个文艺思想比较混乱、各种观点莫衷一是的文艺形势下，黎城县又发生了“离卦道”封建会道门鼓动道徒冲击抗日县政府的恶性事件。于是在1942年1月16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与中共晋冀豫区党委联合召开了太行区文化界座谈会，与会者有400余人。会上，党政军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对边区的文化工作提出了五点希望：文化工作者服从每一个具体的政治任务，应该是今后文化运动的指针；广泛发挥文化工作、文艺作品的批判性；动员根据地、敌占区的一切新旧老少文化人、知识分子到抗日文化战线上来；文化工作、文艺创作要为广大群众服务；每个文化工作者要做好一个村的调查工作，来丰富作品的内容。杨献珍在讲话中，对过去文化工作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倾向，对文化工作者好高骛远、个人主义、不注意研究社会问题等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赵树理在发言中，则以许多真实、生动的例子，说明了文艺大众化的迫切需要。这次座谈会总结了抗战以来文化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和讨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譬如文艺创作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工作者的修养问题、通俗化与大众化问题等等。这次座谈会是山西解放区文艺发展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为其后不久的学习《讲话》精神、开展文艺整风奠定了基础。

在晋绥根据地，1942年夏围绕短篇小说《丽萍的烦恼》展开的讨论与批判，是文艺整风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作者莫耶，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女作家。作品发表在《西北文艺》1942年第2期。小说描述了城市女知识青年丽萍，跟随男友林昆投奔抗日根据地，但却经受不了长期的战争环境和困难生活，同比她大许多岁的老革命军官赵国华结婚。婚后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但精神生活却空虚无聊，特别是丈夫要求她像军人一样服从他的时候，她更感到无限的烦恼。应该说，这篇小说反映的生活是真实的，且有较高的艺术性。但作品发表后，却招致了尖锐批评，认为小说违背了生活真实、丑化了革命军人，“是一篇含有小资产阶级偏见和歪曲现实的作品”。批判无限上纲，甚至判定“这篇小说是反党的”。尽管作者发表文章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辩解，但批判的锋芒却愈加尖锐。这一事件，反映了山西解放区文艺界“左”倾思想的存在。

20世纪40年代是山西解放区文学的一个涨潮期，毛泽东的《讲话》无疑起了春风化雨的作用。为了进一步繁荣文学、培养作者，解放区的各级文化、文艺部门，纷纷办起了文艺报刊。晋冀豫边区文联创办了《北方杂志》，为综合性文艺月刊，1946年6月15日创刊，陈荒煤为主编。刊物除发表文学作品外，还发表了大量文艺理论文章。1947年3月停刊，共出版7期。太岳区出版了《太岳文化》，1946年10月1日出版,江横任主编，1947年6月停刊，共出9期。《新华日报》（太行版）出刊了由太行文协编辑的《太行文艺》副刊，1949年2月5日创刊。此后，太行文协又编辑出版了《太行文艺》月刊。晋绥解放区的文艺报刊也办得十分热闹。晋西文协分会创办了《西北文艺》月刊，1941年7月5日出刊，卢梦任主编，1942年6月15日休刊，共出8期。《抗战日报》创办了《吕梁文化》文艺副刊，1943年3月6日创刊，亚马任主编，同年9月30日停刊，共出版16期。边区还出版了由毛泽东题写刊名的综合性刊物《人民时代》，1946年1月1日创刊，半月刊，穆欣任主编。该刊除发表时事、评论文章外，同时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剧本以及美术作品，1947年停刊，共出12期。文艺报刊的兴盛，有力地促进了山西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提高与繁荣。

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文艺评奖活动，也是山西解放区发展文艺的一个成功经验。1944年，晋绥边区举办了“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活动。征文要求在内容上反映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对敌斗争、减租生产、除奸自卫。在艺术形式上必须力求通俗，能为工农兵所接受。最后评出戏剧、散文、国画、歌曲等各类作品共29件。西戎等人的《王德锁减租》（眉户剧）、严寄洲的《甄家庄战斗》(话剧)、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通俗故事)、李欣的《新与旧》（小说）等作品榜上有名。太岳行署为表彰“写作上为民立功的模范”,颁发了1946年文化奖金，获奖种类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故事、新闻、戏剧、教材等作品。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催粮差》、毕革飞等的短篇小说《挖穷根》，获得此奖。1946年至1947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教育厅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文教作品评奖活动，政府筹款80万元，最高奖金为8万元，获奖作品共120件。赵树理的小说获得特等奖，毕革飞的短篇小说《张苦孩挖穷根》、袁毓明的短篇小说《由鬼变人》、郑笃的报告文学《英雄沟》、阮章竞的诗歌《圈套》、冈夫的诗歌《申海珠》等获得该奖。文艺评奖活动，检阅了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调动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积极性。

山西革命解放区经过整风运动、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人民民主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经济和文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建设得到了全面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山西文学迎来了它历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其标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方向更加明确、坚定，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得到了改善和加强，一大批山西本土作家成长起来，走向全国，外来作家的创作十分活跃，成就突出，各种门类的文学作品硕果累累，空前繁荣。

三

山西文学 20世纪 40 年代的百川融汇，蓄势而发，高潮骤起，直接孕育了赵树理的出现。而赵树理的出现，又把山西文学提高到、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同时，山西解放区文学又丰富和发展了全国解放区文学，使中国解放区文学变为一种成熟、强大的新文学。它同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国统区文学、沦陷区文学三足鼎立，以自己全新的姿态和品格进入新生的共和国，成为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年代的文学主流。

山西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数千年来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从先秦的荀况、韩非，到唐代的王勃、王维、柳宗元、白居易、司空图，到宋代的司马光，元代的元好问，清代的傅山，近现代的石评梅、李健吾等等。纵观他们的创作，都深受三晋文化的深刻影响，具有直面社会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敢于揭橥黑暗，文风朴素明朗的可贵传统。 20 世纪 40年代的赵树理，承袭了三晋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创造性的变革与发展。他把民族传统、三晋文风、启蒙思想，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民间艺术等熔为一炉，形成了一种集大成式的文学。他是山西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承前启后的杰出作家。

赵树理 1906年 9月 24 日出生于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家境贫寒，少年时即参加各种各样的劳动。他深受农民的生活、习俗、语言与民间文学、地方戏曲的熏陶，又接受了父亲传授的中医药以及打卦算命的知识，因而对旧的农村生活有很深的了解。 1923 年小学毕业，后到板掌村任小学教员，大约一年，被无故免职。1925 年考入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在这里，赵树理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启蒙，接触到新文学。他参加过校内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并于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为逃避国民党当局的搜捕，潜回家乡，失掉学籍与党籍。 1929 年初在沁水县小学教师报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但随即被捕，被押送到太原自新院， 1930 年获释。此后

长年流浪，奔走于太原、沁水和河南开封等地。其间曾两度任小学教师，同时还当过录事、差役、店员等。在流浪中，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在“自新院”期间曾奉命写过一些小说、杂文，刊登在《自新月刊》上。1930年12月写作的旧体诗《打卦歌》，发表于《北京晨报》上，这是他为尝试旧体诗的难易而作，显然有追求旧格律的痕迹。短篇小说《悔》和《白马的故事》格调低沉，有明显的欧化倾向。1932年赵树理发表长诗《歌生》，创作风格为之一变，显示了他向口语化、大众化方面转变的努力。1933年发表中篇小说《有个人》，1934年发表长篇小说《盘龙峪》，标志着他的大众化写作风格的逐渐形成，他的小说已摆脱欧化倾向，趋于朴素通俗。1936年赵树理应朋友之聘，任上党乡村师范语文教师，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编写了各种小型街头剧，还亲自参加演出。1937年加入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同年重新入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在长治、阳城等地任牺盟会干部，负责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后历任《黄河日报》、《抗战生活》、《中国人》等报刊编辑。几年间曾写过许多通俗的小说、诗歌、戏剧、曲艺、评论等。1942年初，他到华北党校从事文化普及工作，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小说。1944年调任华北新华书店编辑，1945年后参加《新大众》报的编辑工作。这一时期，他除做一些编辑工作外，其余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深入基层工作和从事小说创作上。1943年到1949年，是赵树理创作的黄金时代，他终于开创了一条坚实而宽广的“大众化”创作道路。

这条“大众化”的创作道路，经过了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赵树理1930年前后的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五四文学烙印和欧化倾向。此时他四处流浪，生活无着，对社会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有着广泛的接触，农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贫乏使他感受尤深。他意识到轰轰烈烈的五四文学浪潮，其实离农民还很遥远，农村的文化市场依然被封建文化和旧文学占领着。这时，远在上海的左联成立，随即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明确倡导“文学的大众化”，认为这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在1932年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北斗》、《文学导报》等刊物发表了许多关于“大众化”问题的文章。左联的“大众化”理论对赵树理影响很大，他开始思考怎样走一条“大众化”创作道路的问题。1932年初，山西的“大众文学研究社”成立，《山西党讯》副刊是研究社的重要阵地。1934年前后，《山西党讯》副刊展开关于文学形式、语言的“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杨焦圃、王中青、李延年、赵树理都极力主张文艺的大众化。赵树理在副刊上发

表了多篇文章，在署名“何化鲁”的《欧化与大众语》一文中说：“首先我以为应该慎重的是出发点的问题。须知道这问题的提出是为大众，不但是想让文学渐渐的接近大众，有欣赏能力，并且有创造的可能和机会，使文学变成社会的东西，变成为大众的东西。”在理论的引导下，赵树理此时创作中的中、长篇小说，“大众化”的特征已基本定型。正如他后来说的：“我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 1934 年。”[3]作为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进步作家，此时他已下定决心：“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分一分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4] 1941 年 8 月，在太行解放区从事编辑工作的赵树理，与他的老战友王春、林火等人发起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聚集了众多倡导和写作“通俗化”作品的作家，如袁勃、李庄、江牧岳、冯诗云、华山、章容、苗培时等。在赵树理等人编辑的《抗战生活》革新号第 6 期的《编后记》中，明确地把“通俗化”作为这个研究会的努力方向。“在‘通俗化’方面，我们不过初步来一个尝试，这是我们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我们今后最应努力的方向之一。”通俗化研究会以《抗战生活》、《中国人》报，以及后来的华北新华书店和它所属的《新大众报》等为阵地，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通俗化文艺作品，直接地推动了山西解放区的文学创作，赵树理在其间做了大量工作。 1942 年 1 月，在太行区文化界座谈会上，赵树理、王春更是极力主张文艺创作的通俗化、大众化，赵树理以大量的事实、例证说明：根据地农村的文化阵地，依然充斥着众多的封建迷信小本本，毒害着我们的农民。我们只有创作更多通俗化、大众化的文艺作品，才能赶走那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 1942 年毛泽东的《讲话》传到太行山解放区，赵树理读了非常兴奋，说毛主席批准了他的文艺主张。1947年 8 月 15 日，赵树理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艺术与农村》一文，文章就解放区农村的文化生活作了全面的概括与论述，认为戏剧、秧歌方面的状况最好，新作品在到处演出。其他的音乐、歌曲、图画、诗歌等，则有很多空白。谈到小说，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小说和新诗一样，在农村中根本没有培活了；旧小说（包括鼓词在内）在历史上虽然统治农民思想多年，造成了不小的恶果，但在十年战争中，已被炮火把它的影响冲淡了，现在说来，在这方面也是个了不起的空白。”为此，赵树理真诚地呼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要“分别到农村对各种艺术活动加以调查研究”，“大量制成作品，来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5]。作家对

农村文化生活的谙熟、对农民缺乏艺术作品的焦虑以及一个革命作家的责任感、使命感可谓溢于言表。十多年时间，赵树理就是这样探索着、实践着、宣传着他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成为一位杰出的人民作家。

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这是赵树理对山西文学、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1943 年 9 月，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之广、影响之大，在解放区以前的文学中是罕见的。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发表了一批更加贴近现实、着力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的小说，包括揭示农村民主改革中新政权的不纯的中篇《李有才板话》；以一个地主之口形象地解说地主如何以地租剥削农民的短篇《地板》；以一个村为缩影，展现北方农村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巨大变动的中篇《李家庄的变迁》；写高利贷盘剥下农民悲惨命运的短篇《福贵》；写土地改革运动的复杂性和“纠偏”现象的《邪不压正》；以及描写农村妇女民主意识觉醒的短篇《孟祥英翻身》和《传家宝》等等。

中国乡土小说的出现并不晚，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鲁迅、茅盾、叶紫、沙汀、艾芜、王统照等人，都出色地描写过乡土中国和多种农民形象，但在他们的笔下，农村是被解剖的农村，农民是被启蒙、被同情的农民，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俯视的创作态度。而在赵树理的笔下，农村是一块现实的、变革着的土地，农民是被放置在中心的真正的主体，尽管他对农民身上封建、落后的东西也采取了讽刺、批判的态度（这是他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但他更倾力展示的是历史变革中的农民身上的那种觉醒、斗争、智慧以及他们的可贵品格。他对农村和农民选取的是一种平等的平视角度。从俯视到平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创作姿态的一次深刻转换。

赵树理在小说中主要塑造了如下三种类型的农民形象。首先是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还未觉醒、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传统的老一代农民形象。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胆小谨慎，凡事都要看看阴阳八卦，是一个被封建迷信观念扭曲了的人。三仙姑则是一个由于婚姻不幸，然后装神弄鬼吸引年轻人，满足自己情感需要的独特女性，是一个被封建婚姻葬送，又用变态的方式与封建社会进行抗争的人物。如《传家宝》里的金桂婆婆，不仅自己身陷在封建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里，而且还要顽固地把这一套作为“传家宝”传给下一代，可见旧的东西要革除是何等困难。赵树理对老一代农民了解最多、感受最深，因此刻画也尤为成功。他不仅真实、深入地揭示了老一代农民身上的封建迷信、小生产观念，反映了中国革命要让农民在精神上真正得到解放，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他又真诚地表现了这些农民善良、朴

实、勤劳的品性和他们在社会大变革中的喜剧性转变，使我们看到了社会的艰难进步和生活的希望。赵树理小说中的另一种形象是一些已经和正在腐化的、变质的青年农民，特别是青年干部的形象。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小元，他被“小字辈”推举为村公所的代表，刚当干部不久就改换了穿戴，不再下地劳动，“架起胳膊当主任”，“逼着邻居当奴才”了。如《邪不压正》中的小昌，因参加土改积极而当了农会主任，一旦掌权就分到了最好的房子、土地，变得不可一世，以至和地主的狗腿子混在一起，搅乱阶级阵线，斗争雇农小宝，强迫软英嫁给自己的儿子。小元、小昌都是贫雇农出身，他们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广大农民，而是为了“打倒地主做地主”，封建主义的改朝换代又在他们身上悲剧性地重演。赵树理小说的第三类形象是新农民形象，作家把这类人物当做小说的主人公，倾尽全力去刻画。尽管他对这类人物不像对老一代农民那样熟悉，但他努力发掘他们身上的新素质、新特点，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去表现，因此塑造得血肉丰满，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小二黑是村里的青抗先队长、民兵英雄，在战斗中勇敢、机智，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有点腼腆、和善。小芹端庄美丽、活泼大方，在为争取爱情婚姻自主的斗争中，表现得坚强果敢。新政权的建立、新《婚姻法》的颁布，不仅使新一代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了解放，在爱情和婚姻上也得到了自主和自由，这是一种多么珍贵的人的解放啊！李有才是农民中的那种“智多星”式的人物，他一生清贫，却淡然处之，活得洒脱。在斗争展开但没有把握取胜时，他善于忍耐、观察、等待时机；当斗争时机已经成熟时，他足智多谋、运筹帷幄、勇敢果断，表现了一种坚定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用编快板的形式，反映农村的生活状况、阶级斗争，鼓舞和团结村民，揭露和打击地主，成为一种有力的文化斗争武器。他的这种深沉、坚忍、理智、幽默、智慧以及天才，典型地概括了农民身上的那种宝贵素质和品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全新的典型形象。《李家庄的变迁》中的主人公铁锁，勤劳、厚道、善良，旧社会把他推向了人生绝路，是共产党使他获得了希望和新生，并在革命队伍中成长为一名勇敢的战士，以后又担任了区长。在铁锁这一人物身上，浓缩了山西 15 年间的政治、经济、战争史，展现了一个普通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全过程。

创造农民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艺术形式，是赵树理毕生的创作追求。它成就了赵树理的创作，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赵树理明确地宣称：“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

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6]赵树理对五四文学因欧化倾向形成的与民间的隔膜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现代小说如何以民族化、大众化的形式走近民众，特别是农民读者，成为他从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思考的一个大问题。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和努力，他终于突破了这一难题，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首先，他摒弃了旧的章回小说的程式化的框架，而承袭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故事完整性的结构特点。开头总要把人物、地点介绍清楚，中心故事要贯穿到底，最后还要把人物的结局、故事的结果交代明白。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还吸收了传统说书艺术中的“扣子”手法，大故事中套小故事，大故事继续发展，小故事情趣不断。其次，在描写与叙述的关系上，赵树理也吸收了传统评书的手法，不把景物、肖像、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独立的、静止的描写，而把它们进行简化，纳入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中，由故事带出人物、景物，由人物行动带出肖像，在行动中展示人物性格和心理，这样就加快了故事的进展，使整个叙述浑然一体。赵树理的叙述语言朴素、简练、幽默。既是日常生活中的“大白话”，又经过精心的艺术提炼；既朴实无华，又有丰富的文化蕴涵，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赵树理创造的是一种现代评书体的小说形式。

赵树理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曲艺家。他在小说创作的同时，一直没有间断戏曲和曲艺的整理、改编、创作。他自幼酷爱上党梆子，后来成为研究这一剧种的专家。抗日战争初期，他就创作了新编历史剧《韩玉娘》、《邺宫图》，1941 年创作了揭露日军和汉奸利用反动会道门策划暴乱的《万象楼》。此外还创作有反映现实斗争的戏剧《打倒汉奸》、《好消息》、《巩固和平》，话剧《两个世界》。他在曲艺创作方面也有大量作品，包括快板、小调、鼓词等各种形式，如《茂林恨》、《汉奸阎锡山》、《为啥要组贫农团》、《考神婆》等。他在戏剧、曲艺的创作中，执著地探索着“通俗化”、“大众化”的路子，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创作经验。

1947 年 8 月，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在中央局宣传部的指示下，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研究、学习赵树理。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是今后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赵树理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山西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块里程碑。

四

特定的时代氛围、地域文化、文学思潮和作家群体，是产生文学流派的丰厚土壤，“山药蛋派”在 20 世纪 40 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解放区数千万人民特别是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翻身的迫切需求，他们需要新的戏剧、曲艺、音乐、文学，这是一个浩如大海的文艺市场。作为领导解放区的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意识到创造一种“新的人民的文艺”对于鼓舞和团结人民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是何等重要，因此在文艺工作的领导上、组织上、思想上做了大量工作。1942 年毛泽东的《讲话》，对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制定了一个科学的、系统的理论框架，明确地提出了工农兵的文学方向，强调要走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道路。山西的地域文化本质上讲是传统的农业文化的一种体现，它的思想内核与审美取向，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有许多相通相合之处。山西文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倡导文艺的“大众化”，这一文艺思潮绵延不断，在 20 世纪 40 年代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涌现出许多逐渐成熟的文学作品，正是这诸多因素的遇合、凝聚、孕育，促成了“山药蛋”文学流派的应运而生。“山药蛋派”的正式命名，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后。但这一文学流派确实产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且它一产生就显示出鲜明的特征、可观的实绩和蓬勃的生机来。20 世纪 40 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在冀中地区，也曾孕育了“荷花淀”文学流派，孙犁、康濯、李满天等创作了一批风格相近的文学作品，但它的作家群体、作品数量以及社会影响，当时远不及“山药蛋派”，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的 20 世纪 50 年代才逐渐形成，70 年代末得以命名。

赵树理是“山药蛋派”的开创者。他从小就深受民间文艺、民间文化的熏染；青年以后又到处流浪，对晋东南以至全山西的民众生活以及民情风俗有着深刻的感受和了解；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探索“大众化”“通俗化”的创作道路，40 年代又与人发起成立“通俗化研究会”，在创作上、理论上经过了长期而丰厚的准备。1943 年之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邪不压正》等一大批优秀小说脱颖而出，在全国解放区和中国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正如周扬在 1946 年所评价的：“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

人民艺术家。”[7] 赵树理属务实派，不擅理论，但他以自己的创作历程、创作实践和创作实绩，在山西解放区树立了一面旗帜、一个标尺，极大地影响和鼓舞了山西的众多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在晋绥边区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人称“五战友”，1942 年冬天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部队艺术学院同时回到晋绥区，分配到晋绥文联工作，形成了一个年轻的作家群体。文联的负责人亚马、卢梦、周文，都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在文艺“大众化”问题上发表过多篇理论文章，成为这个作家群体的理论批评家。不久，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晋绥边区，更坚定了这个作家群体的创作思想和信心。之后，马、西、李、孙、胡五作家，多次深入农村、部队、工厂体验生活，开始了他们的创作生涯。而此时，也正是赵树理的创作势头强劲、影响日隆的时候。“五战友”的心同赵树理是相通的，他们的创作追求是一致的，赵树理的创作对走上创作道路不久的“五战友”来说，无疑起了极大的启迪和鼓舞作用，促使他们尽快地成长起来，成为“山药蛋”文学流派的主将。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 20 世纪 40年代发表的作品有：马烽的《金宝娘》等 12 篇小说，西戎的《喜事》等 10篇小说，孙谦的《村东十亩地》等 7 篇小说，束为的《红契》等 10篇小说，胡正的《碑》等 4 篇小说。马烽与西戎合著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孙谦写有 4部秧歌剧，西戎、孙谦与人合作一部戏剧《王德锁减租》，胡正与人合作一部戏剧《大家办合作》。他们的作品在边区的报刊发表后，受到了解放区读者的普遍欢迎，有的作品获得了边区举办的文艺奖项。特别是《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时，在整个晋绥解放区掀起了“吕梁英雄热”。1946 年下半年在重庆《新华日报》转载，引起了国统区的关注。在山西解放区，晋绥作家群是一个阵容很强、创作活跃、引人注目的创作群体。晋东南太行区的刘江，与赵树理等作家在一起工作时间较长，也积极地实践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发表过《冬梅》、《新仇旧恨》等一些作品。太岳区的李古北，创作有短篇小说《未婚夫妇》、《大柳庄纪事》等。刘、李的创作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是“山药蛋派”的重要作家。分散在山西解放区的赵树理、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刘江、李古北等一大批作家，虽然没有统一的创作组织，赵树理与“五战友”甚至在 20 世纪 40年代都未曾谋面，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在北京“会师”，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文艺宣言，但他们由于个人经历、人生背景、文化构成、写作环境等方面的诸多近似，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形成了在创作思想、表现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一致性、共同性，以致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